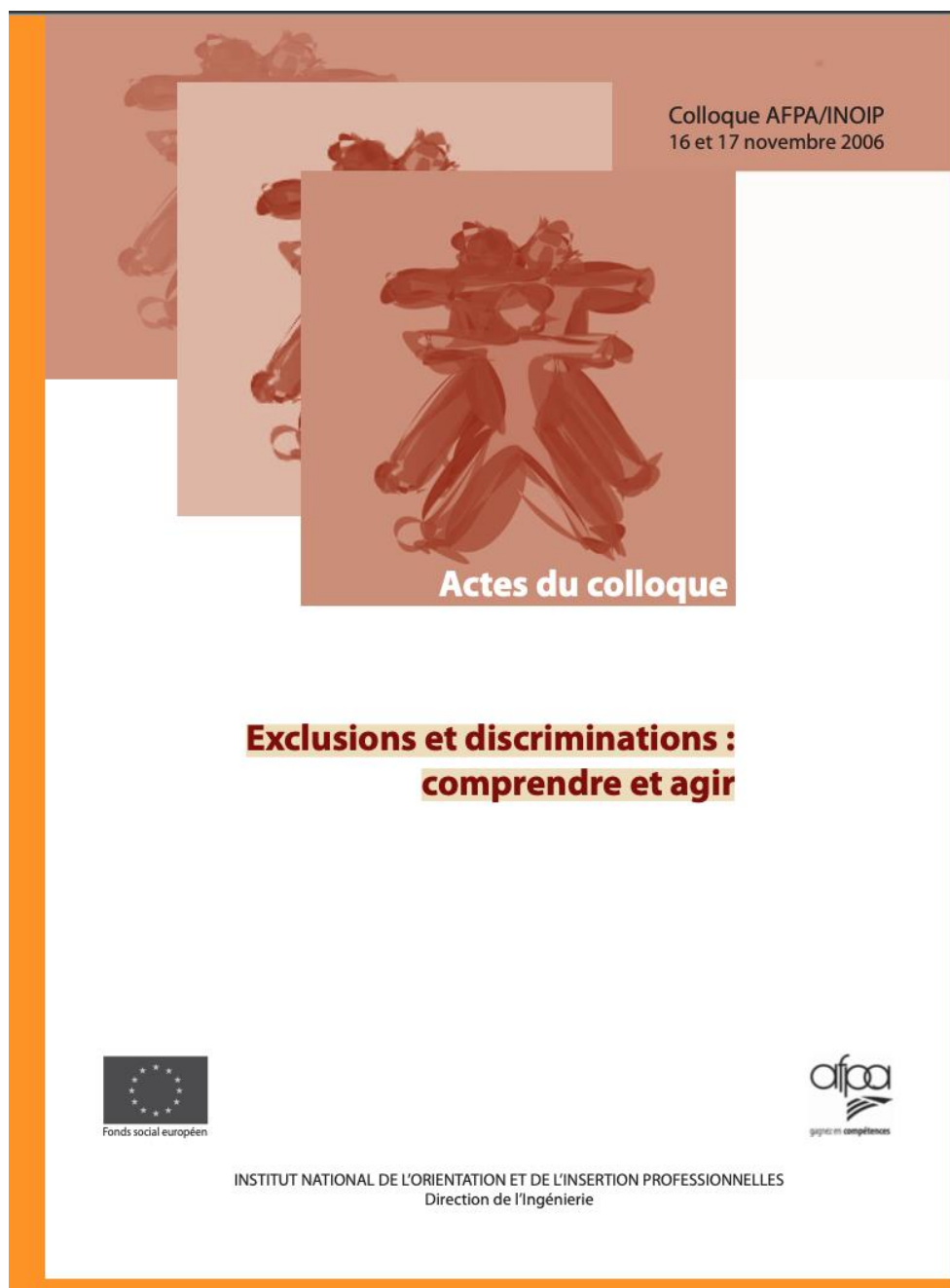


排斥和歧视：理解和行动

AFPA-INOIP排他性座谈会 2006年11月16-17日 里尔



会议介绍 布鲁诺-西蒙（AFPA - INOIP主任）。

发言人。

Jérôme DI GIOVANNI (ACCÉSSS -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促进健康和社会服务平等社区联盟) 残疾人的隔离和平等结果权 9-12

Pierre TAP (欧洲行为和机构研究中心-CEICI-
葡萄牙) 排斥和歧视对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影响

13-24

Ahsène ZEHRAOUI (LISE CNRS CNAM - Paris) 年轻人与融合 - 障碍赛

25-30

Michel MERCIER (比利时那慕尔大学) 非歧视、积极歧视和残疾人的社会包容 31-36

David BOURGUIGNON (比利时鲁汶大学) 我失业了, 我被污名化了

37-44

Geneviève VINSONNEAU (巴黎第五大学) 异性恋恐惧症和外国人的社会构建 45-52

Sid Ahmed ABDELLAOUI (鲁昂大学)

掩盖的种族主义的万能性或如何使我们意识到在我们与被污名化的可见少数群体的关系中起作用的东西 53-58

Christophe ANDRE (巴黎第十大学) 社会排斥和自尊 59-64

Lucie LAMARCHE (加拿大谢布鲁克大学) 职业排斥的弊端 65-70

Denis CASTRA (波尔多大学) 职业排斥是一种共识 71-74

Raul MELO (卫生部, 毒品和毒瘾研究所--

葡萄牙)从前,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或通过游戏创造社会融合的背景 75-82

Jean-François AMADIEU (巴黎第一大学) 如何识别歧视? 有哪些测量工具? 83-90

Dirk STEINER (尼斯大学-索菲亚-

安提波利斯) 对正义的看法是理解和打击就业歧视的机制 91-96

Claude LEMOINE 后记 97-98

排斥和污名化对个人和社会身份的影响

简介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中，对于科学解释与对情况和研究对象的主观理解之间的困难衔接，一直存在着方法论的争论。我一直为这种衔接的必要性辩护，它迫使我们一方面在个人或集体的生活故事和案例研究之间徘徊，另一方面在大样本的严格和可量化的研究之间徘徊。

但是否有可能将可识别的人群定义为 "被排斥"？

这是因为社会身份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可识别的归属类别，并伴有限定词。我想在此表明，有必要分析排斥，既作为一种客观现实，也作为一种经验感受，在其与多种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的复杂关系中进行分析。但是，正如我在里尔的口头报告中所做的那样，我将从我描述为 "质疑

"的遭遇开始与你们进行反思，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都是关于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身份和我自己与排斥和污名化有关的身份。

一次 "问询 "会议

今天是2005年3月24日星期四。从帕米尔出发，我必须去图卢兹参加一个关于罗杰疗法的宣传会议²（晚上，在Naissance à

l'écoute中心），并参加亚历山德拉的论文答辩（第二天）。我想坐火车，但计划坐公共汽车到Auterive站（30公里；20分钟），在那里我们将坐火车到图卢兹。很拥挤，我坐在靠窗的一侧，我的右边有一个空位，在走廊一侧。我看到一个男人来到这里，"无家可归式"（！），显然是喝醉了。在远处，他用手指着我的方向，喊道："我要到老头子旁边去"！他说："我想去。（³他在我身边重重地坐下来，盯着我.....我也这样做！）。我也是这样做的！--（他）L.

"老人.....我尊重他们，"他说，抚摸着我的外套的衣襟.....你是谁？你的种族？"⁴他说，仔细地看他将称之为我的 "文件夹 "或 "包"（公文包）的东西.....

"用你的皮文件夹，你是谁？"当然，这种粗暴的入侵一开始让我感到不舒服.....不过，我想到了治疗中的罗杰态度（移情、同理心、无条件的积极性），但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明显以人为中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即使他们以警察的模式质问我。- L.

(他)你有一张好脸!- M. (我)就像圣诞节的父亲!他生气了.....我甚至觉得他要打我。- L. 不，别管圣诞老人了（我不相信！）!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我决

¹图卢兹大学Le

Mirail心理学荣誉教授，欧洲行为和机构研究中心（CEICI，葡萄牙科英布拉）的共同创始人。培养研究中心（CNAM，巴黎）成员 官方网站：www.pierretap.com。

² 我是一名罗杰治疗师（职业身份）这一事实在我的个人身份定位中当然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我更会发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被质疑，我在这里叙述的是这段关系的入侵。

³ 我应该指出，他可以选择车上的几个免费座位。他为什么选择

"坐在老人身边"？我想是因为我在看着他，而我们通常倾向于把头低下，不看无家可归者的脸？

⁴ 社会阶层、职业等因此被称为 "种族"。他后来又回到了

"种族"（社会和文化差异）。我的反应是说我不同意。"我是反种族主义者.....我们都是平等的。他同意了，但对自己被他的矛盾所 "愚弄

"感到后悔（"好吧，去他妈的！他抓住了我！"），这证明他正在经历一场战斗的局面.....。

定回答他，并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M. 我读了--L. 你读了什么？- M.
一篇关于残疾人、盲人和聋哑人的论文.....--L.
啊，一个老师！.....你的包里有什么.....打开你的包！”。（我内心微笑，认为他要我
“清空我的袋子”，说出我是什么的一切！）。被的定义由有：脸、身体、毛巾.....）。 -
M. 我的包里有亚历山德拉的论文，明天将在图卢兹进行答辩- L.
啊！打开你的包，给我看看论文！”。我打开袋子，拿出论文，给他看.....他的态度变
了，好像我的回答是对他有信心的表现。他仔细朗读了标题
“感官障碍青少年的心理体验：听力和视力障碍青少年的自尊、融入感、压力、应对策略和自我定位”.....他在“心理”和“应对
“两个词上停了下来，但没有提出任何问题。然后他读出了“陪审团成员”。- L.
“但那时，你是一个法官”。我向他解释，并不是所有的陪审团都是“司法”的！- L.
这很好.....封面很漂亮⁵，但重要的是下面的内容！他翻开论文，两次假装把它还给我，
然后又把它收回来（似乎在试探我的信心：这个珍贵的东西我可以从你那里偷走...）。
最后他满意地把它还给了我.....我把论文放回公文包有些困难；他察觉到我的颤抖。 -
L. 等等，我帮你.....别怕我！我是你的朋友。 -
我从小就一直在发抖.....这和你没有关系！”。然后他问我关于我的残疾和它的起源，
然后又问我自己的起源。 -
我尊重老人，因为他们经历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参加过抵抗运动吗？- M.
不，战争期间我还是个孩子。L. 你杀了人吗？- M. 没有 - L.
我做了.....（接着是结结巴巴的句子和沉默）（.....） - L. 你叫什么名字？- 皮埃尔先生
- L.
好吧，皮埃尔先生，你很好。让我们握手言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四次提出这种
交流仪式；但第五次他伸出食指，要我用食指触摸它.....第二天我才明白这个手势的
含义，与论文的封面和亚当的创造有关（见注5）。握手是对一项协议或类似情况的点睛之笔。 - L. 你有女朋友吗？- M. 不，我一个人住 - L.
我也是！（握手！）.....你有过吗？- M. 是的，但我已经离婚了。 - L.
我也是！（你打了她吗？- M. 不！L. 我做了！（不要用爪子抓！） - L.
你对她做了什么？他将自尊与他所问的问题联系起来：--
“这是个好问题，不是吗？有几次，他谈到了自己，与他的问题没有任何联系。但这些问题是评价他自己的一种方式，并测试他能对我的信任。例如，我了解到，他来自安道尔，在那里他买了香烟在法国销售。因此，他觉得自己想抽烟，尽管巴士上禁止抽烟。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没有理会，点燃了他的香烟。司机提醒我，吸烟是被禁止的。”十五分钟都离不开它，这有点太丰富了”。然后，我的提问者用他的拇指甲压灭了他的香烟！我的提问者在他的拇指甲上压灭了香烟。几秒钟后，他听到一阵手机铃声。他转身对年轻人说：“如果有人问起我，你就说我不在这里！”。 - L.
所以你是一个精神病学家？- M. 不，我是一个心理学家。 - L.
啊，这很适合我！但你是弗洛伊德式的还是拉康式的？- M. 也不是，我是罗杰”- L.
那是谁，罗杰（Rogé）？- M. 诺，罗杰斯（Rodgersse），卡尔-
罗杰斯，他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疗法。 - L. 写下他的名字！- M.
我没有任何纸。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油纸，有四张邮票那么大。我在上面写了卡尔-
罗杰斯⁶。他满意地把报纸装进口袋，对我说。 - L.

⁵应该指出的是，封面上的背景图像代表了上帝的手和亚当的手，象征着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创造亚当”。 -

⁶我写的是卡尔而不是卡尔，这表明我并不是完全平静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完全平静。

对我来说很重要，你刚才所做的.....--L.

在治疗中，会发生一个人从你所说的话中改变？- M.

可能是，但我们很少知道.....或者是二十年后！”。但重要的是人自己发现的东西。- L.
那治疗师可以改变吗？- M.

当然，他也参与其中。他开始非常用力地敲打毛巾的顶部（到了伤害手指的程度），并说。- L. "那里面有很多东西！"。 -

我喜欢诗歌.....Nerval.....Baudelaire.....那么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M.

这些天，杜贝莱，因为他写道："快乐的人，像尤利西斯一样，进行了一次美丽的旅行，然后满载而归，有理由在他的余生中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中间"⁷，这与我的关注点（作为一个退休人员！）很相符.....--L.

啊，是的，杜贝莱，一个中世纪的诗人...我还想提出一句话："你必须经历过内心的混乱，才能以流星之美看待生活"⁸（他将这句话与尼采联系起来）。现在，你想要什么？- M. 我必须要做胆囊手术。我希望它能顺利进行!-

好吧，我现在就不问了.....但你应该少吃点富含的东西！"我说。他不会说他喜欢什么，因为我们到达了奥特雷夫车站。在下车之前，他提出要亲吻我。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下车后去和站长说话。我上了火车。当我在走廊上经过时，他看到我并说"是你吗？(仿佛是为了说服自己，他没有梦到我们的对话！)，"是的"。然后他转向附近的两个旅客说："你们认出了他，是他！"。他是我的导师!这整个场景持续了不到20分钟!但它是剧院还是电影院？在这20分钟里，那个我不知道名字、姓氏和绰号的提问者设法与我交谈，获得了很多关于我的信息，并透露了关于他自己的最低信息。然而...我感觉到他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得不说，从我决定"说真话"的那一刻起，我再也闻不到他身上的酒味，再也看不到他脸上的伤痕，我专注于他的眼睛，流动而有活力。事后，我对自己说，那20分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短的一次治疗...是以人为本的，没错，但哪一个？我自己的？当然是他的？也许，两者都是？毋庸置疑!显然，这段对话没有任何罗杰式的内容，也没有任何治疗性的内容.....然而.....对两位主人公来说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个人参与研究对象的影响

在本次会议结束时，我想澄清几点，这对理解这个故事和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非常复杂的方式至关重要。

1.我显然被这次意外的遭遇所

"标记"，因为在同一时间，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消失了几个月，只有在寒冷的天气到来时才重新出现，并告诉我们他如何在巴黎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在他四十岁生日后离开⁹和圣诞节回来之间。

⁷经过核实：杜贝莱不仅是在谈论尤利西斯，也在谈论征服金羊毛的杰森。他说

"住在父母中间....."，而不是

"住在自己人中间"。这些对我来说是重大的错误和遗漏!我刚刚回到了我童年的城市生活。

⁸我不知道这个参考，也没有去查。但一位葡萄牙同事向我指出，尼采刻在里斯本地地铁站的一句话是："需要大量的（内心）混乱才能诞生一颗流星"。

⁹.....周年纪念伴随着由多种压力引起的自我隔离，但这些压力与经济和财政需求无关

2.我立即把这个 "公共汽车的故事

"告诉了我所有的亲戚，这对我自己的叙事身份有强烈的体验¹⁰。然后我有机会观察记忆效果的重要性。我的故事随着每一次新的 "叙述"和某些部分的对话回到我身边而得以完成。

3.这就是我决定写作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讲述和发表我私人生活的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受到了未知提问者的强烈质疑。对每个研究者来说，"自我是可恨的"，然而它必然会介入到选择和对待研究对象的方式中。否认这些隐含的、往往是自愿隐藏或伪装的影响，并不能改变其现实。如果读者对我的做法感到震惊，我表示歉意，但正如Paugam正确指出的那样，为了理解排斥或社会不合格的工作过程，必须让两个主要方面发挥作用。

* 在宏观社会学层面，与这些现象相关的集体和社会表述，促进了被视为 "穷人"、"不稳定 "或 "被排斥 "的人的（身份）"类别"的阐述。这些分类过程是通过社会援助机构、社会干预的制度形式（公共或私人）来构建的。¹¹

*

在微观社会学层面上¹²，我们必须考虑到人口（个人）赋予他们生活经验的意义，他们对那些认为和指定他们为 "被排斥"的人所采取的行为，以及他们在所面临的不同情况下形成的适应模式（Paugam, 2002, 2001, 1996, 1993）。(这些话也适用于研究者本人，他并不是一个无党派或无感情的机器)。

我完全赞同这种二维性，因为我也赞同卡斯特尔的观点，他将工人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与同一人在社会性网络中的参与这一轴线进行了对比（卡斯特尔，2001，1995，1991）。但在我看来，主要的问题是，这些维度以及这些轴线可以被认为和/或体验为积极的或消极的：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和友谊，意义和行为被认为和体验为合法或不合法的。当我们谈到体育领域的取消资格时，只要运动员没有遵守他或她的运动的运作规则，就会被排除在外。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排斥并不是指自我取消资格，尽管这种过程确实存在。就脱离关系而言，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对协会、工会或政党来说很重要的术语。加入意味着外部压力（从友好的压力到改变信仰）和内部决定（同意将自己投入到一个集体事业中，这个事业超越了自己，而且自己也相信它）。相反，脱离关系可以是一个外部决定（排斥、逐出教会等）和/或一个内部决定（不续签合同或卡片，自愿脱离）。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二维的东西要阐述：一个是正面和负面的对立，一个是引入决定的地方，由内部或外部控制。当然，其他维度使这种简单的¹³表述变得复

¹⁰ 我曾在 "身份与排斥 "一文中讨论过Paul Ricoeur(1990)所提出的叙述性身份概念的重要性(Tap, 2005, pp.60-62)。

¹¹根据经验，我想说这些干预措施并不限于社会援助服务（社会援助、财政援助、RMI管理等）。它们还涉及警察、医疗（萨穆、急救服务、精神病院）、银行（封锁账户、银行排斥）、司法、地方（市政厅）等。

¹²这个层次恰恰与我所说的 "生物-心理-社会 "层次相吻合。但我的言论并不意味着是争论性的！

¹³我不说简单化，因为亨利-瓦隆对儿童的成对思维（白-黑、昼-夜、右-

左等）进行了很好的分析（1945年），这当然要克服，但不能污名化，除非它不是用于歧视-

区别（意味着尊重差异），而是用于歧视-

污名化（种族主义等）！我认为这是对的。（请注意，知觉上的颜色歧视不是污名化的，种族歧视才是）

杂。例如，被排斥者的活动和被动之间的对立，意识和转换行为（停止吸烟等）的困难之间的对立。从融合到排斥：从文字到人.....的痛苦。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正经历着经济困难，面临着失业和生活条件的恶化。这些困难会因为身份的污名化而变得更加复杂。身份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稳定性和统一感变得不可能。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与普遍的受害动态有关¹⁴；它们扩散到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及个人的各种活动中。

因此，研究排斥的影响与个人经历、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以及改变或加强文化价值有关，是合理的。对这些影响的关注贯穿了所有的人文科学，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特别是与工作、健康和教育有关的部门。排斥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虐待。重要的是要知道是否真的在与它的影响作斗争，以及相反的凝聚力、插入或整合过程是否在相应地进展。当我们分析凝聚力、插入和融合这些概念的使用方式时，不仅在关于排斥的研究文献中，而且在政府、政党或协会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都应该找到实地的解决方案，那么，对于所涉及的过程是否有任何共识是值得怀疑的，更不用说避免排斥的手段及其影响。然而，所提到的概念是指导当权者和他们所经营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机构的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是代表和价值观的一部分。但他们也隐含地活跃在编织每个公民的个人和关系存在的决定和行为中。例如，我们注意到，"插入

"一词基本上是与职业界联系在一起的，而"融入

"一词则几乎只用于与移民有关。至于已经成为时尚¹⁵一词，作者很少说明其含义，似乎它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必须提出足够明确和有区别的定義。如果我们参考自Lewin（1972）以来心理社会学家的的工作，凝聚力

"是吸引或维持团体中每个成员的一组力量"¹⁶。但Cartwright和Zander（1968）明确指出，相互依赖性越强，群体中的观点就越倾向于同质化，偏差和偏离就越被认可。在凝聚力方面，群体优先于个人，以至于后者必须放弃自己的特性，致力于遵守和达成共识。当然，凝聚力是不能被命令的。它只能是在进步的力量（包括但不与生产的力量相混淆）瓦解时，对（集团的）维护功能进行工作的结果。¹⁷

插入的概念意味着融入一个地区，投资于一个集体空间的想法。被插入的系统在宿主系统中占有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它是

"嵌入的"、"夹层的"，但仍然有明显的区别。它并不与整体融合。例如，书中的插页不是它的一部分；它可以被删除。最后，整合的概念，正如其词源所示，意味着统一性、完整性、整体性的概念。如果子系统（群体或个人）之间的衔接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有

"发挥"，有灵活性，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综合的；这些子系统中的每一个都保持着有区别的身份、地位和功能。因此，真正的融合既不能与同化（子系统不再有区别）相混淆，也不能与个人主义或宗派的区别（子系统之间不再有充分的衔接，主张优先于融合）相混淆。融合显然与排斥相反，因为它意味着欢迎新成员的可能性，新成员将能够建立联系并管理与旧成员有关的职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融合一词被用于接收移

。语言在融合-排斥-

凝聚的动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取决于语言、行动、意识和价值观的肯定之间的联系。

¹⁴在Connexion（2005）的文章中，我回顾了这种受害过程的集体和个人重要性及其对行为的影响。

¹⁵关于时髦的概念，如复原力、项目、凝聚力等，我们注意到，它们的出现恰恰对应着人们和机构的日常活动被认为是异化的时刻，当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没有预期或项目，当我们想象解决方案以摆脱重复出现的难以忍受的情况。因此，时尚似乎是对抗这种异化的有用策略：乌托邦、梦想和想象中的解决方案有时可以让人重拾希望，并通过它获得个人或集体实现"突破"的手段。

¹⁶Germaine de Montmollin, 1977, p. 154 note

¹⁷维持的力量是指团体用来解决冲突，引入谈判和调解，并保持实现共同项目所需的凝聚力。为了采取行动，该团体动员了进步的力量，然后由维持的力量来接管。

民，但理论上它适用于所有内部团体和机构（家庭、学校、公司、邻里、地区、国家）。因此，灵活性是综合系统的特点之一。在个人层面上，它可以被定义为个人制定新策略的能力，如果旧的策略已经变得无效、不相关或危险，就放弃这些策略，这将有利于良好的适应。这种适应性的灵活性意味着有能力做出让步，以最好的方式管理相互矛盾的需求。

排斥是一种消极的动力

但是，让我们来谈谈排斥的问题本身。卡斯特尔认为，这个词涵盖¹⁸大量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人：无家可归者、长期失业者、残疾人、郊区的年轻人。Paugam则认为，在Durkheimian的意义上，排斥一词是一个前概念，它既模糊又含糊。但他也把它说成是一个概念-

视野，因为排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化的失败，分析不平等的再生产及其局限性，更好地界定社会关系的松动及其后果，并最终明确身份危机的侵入。¹⁹但这两位作者强调了社会判断在排斥的定义中的重要性。Paugam说的是社会不合格²⁰，Castel说的是社会无效²¹。人们并没有真正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但他们被消极地归类（污名化），并在达到实际的边缘化之前，经历了脆弱-不稳定和脱离关系（Castel）或脆弱-援助-依赖的复杂过程（Paugam）。即使是那些与社会服务断绝关系的无家可归者，仍然处于拉客、乞讨和对路人采取不同行为的地位（参见无家可归的乞丐和他们与无家可归者的冲突）。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可能是艰难的，正如一个无家可归者网站上的一个人所说：“你永远不会偶然地流落到街头。之前总是有一段非常长的历史，有时可以追溯到童年。简而言之，假设有一天，你肩上的压力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你却打破了。在那一天，你周围的人，看到你不再存在而感到担心或松了一口气，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走吧。漫无目的。免费。无比自由。原本压在你身上的重量一下子消失了.....它在你的脑子里汨汨流淌。你知道你不会再回去了。你走的每一步都让你离你的过去更远，你在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一箱箱的记忆。你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让你发笑。在几个小时内。因为那样的话，就越来越不好笑了。宽限期的状态持续到你花掉你还有的钱为止，最多几天。然后，很快地，反弹变得更加猛烈，因为它被推迟了。这时，退出游戏的诱惑可能变得很强烈。你可以自杀，这样做的缺点是不可逆转。你可以用酒精、毒品和/或或多或少的致幻剂分子更缓慢地结束自己。它能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当它泄气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恢复了。你终于可以把几样东西塞进袋子的底部，然后跟着你的脚步走。欢迎加入俱乐部”²²。正如精神病学专业人员（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以及例如ORSPERE团队所显示的那样²³，医院和诊所现在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一个与排斥和心理痛苦相关的新主题。非典型的、痛苦的、去社会化的和不稳定的病人正以越来越多的数量到来.....

“在现有的整合机制中，这些机制被证明是无效的。多年来，已经实施的社会融合政策在面对排斥时显示出其局限性。作为一个心理健康问题，这种社会心理困扰让人对公

¹⁸ 卡斯特尔，2001年，辩论第一部分第2页

¹⁹ 波加姆（2002年，2001年，1996年）

²⁰ 参见他的论文《社会不合格：关于新贫困的论文》一书，2002年，PUF出版社，Quadrige。

²¹ 20 在CNDP组织的辩论中提到的，参见Castel (2001)。

²² 我没有找到这个网站的互联网参考资料，但网络上的证词成倍增加，更不用说“堂吉诃德的孩子”的行动.....和他们的幽默.....“桑丘-潘萨，回来吧.....堂吉诃德来了！”.....准备再次与风车作战

²³ 参照由Jean Furtos负责（或曾经负责）的ORSPERE网站：<http://www.ch-le-vinatier.fr/ORSPERE/publications/sante-mental-exclusion.htm>

共精神病系统产生怀疑。它还揭示了一个新的精神病理痛苦领域的出现，而通常的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的做法被证明是不可行的。这种心理病理和社会心理上的痛苦不可避免地会跨越身份。无家可归的人90%是男性。文化差异以²⁴不同方式影响移民和流亡者的痛苦。身份也被疾病所质疑（Tap, Tarquinio and Sordes-Ader (2002)等）。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出两个重要的假设。

- 首先可以从前面的评论中推断出：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困难的境地，不管这种境地的来源是什么，他们感到社会和心理的萎靡不振，他们面临着一种苦恼，一种与"断裂和排斥过程的持久性，无论是在个人还是集体层面"有关的社会心理痛苦，并导致"失败的显著恒定"²⁵
- 第二个假设与以下事实有关，即排斥的概念引入了对社会及其机构的批判性判断，这些机构没有能力管理社会凝聚力和促进其成员的融合。

排斥的概念最初仅限于极端贫困，但今天它被扩展到包括不稳定的情况：经济不安全、婚姻和家庭不稳定、难以管理焦虑和压力、难以适应流动性、变化、限制或压力。这不是一个在这里（公共当局、全球化、学校或公司）或在那里（弱势群体）唤起责任的问题。为了理解身份和排斥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我们需要引入中介概念，假设存在一些过程，可以解释规定和没有规定、断裂和避免或管理它们的策略。我想到的有：社会性和关系网络，合法化和授权机制，一个人赋予自己的经验以意义的方式，一个人选择对自己重要的隶属关系的方式，或者阻止自己选择隶属关系的疏远，以及在这些隶属关系相关的活动。卡斯特尔提出的与排斥有关的脱离概念不²⁶应导致我们忘记，人可能会经历职业上的脱离（失业、被放在衣柜里等），但在其他地方找到补偿性或再生性的归属，或者仅仅是替代性的归属。的确，正如Paugam提醒我们的那样，"统计数字证明，经济上的排斥伴随着社交能力的丧失和对社区生活的参与减少"²⁷。但是，受薪工人的理想化形象和工作的准神圣价值不再流行也是事实。然而，我仍然认为，根据罗杰斯所珍视的表达方式，工作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最佳体验发挥作用，并且今天被那些发展积极心理学的人所接受（当然，这是与实证主义心理学相反的！）。我相信，呼吁他们更好地了解生活在困难环境中的人们的真实经历是有益的。²⁸

对困难情况恢复更积极的看法

积极心理学努力分析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也能获得乐观、快乐和幸福的条件。在罗杰斯和他的书 "La relation d'aide et la psychothérapie"（2005年，ESF）之后，我们可以提到西岑特米哈伊和他的流动理论（1990年），翻译成法语的标题是："Vivre, la psychologie du

²⁴ 关于这一主题，请参见Kaës和其他作者的优秀作品：Différences culturelles et souffrances de l'identité（1998）。也可参考本书中跨文化领域的许多贡献者。

²⁵ 根据拉撒路报告 "Les souffrances qu'on ne peut plus cacher"（无法再隐藏的痛苦），RMI的部际代表团认为，这种痛苦当然涉及生活在极不稳定的情况下的人们，但它也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社会化困难中。它们存在于家庭、学校和城市暴力的兴起，以及护理机构中。就成年人而言，他们建立关系的能力大大减弱，这本身就与对自己的不投资和对公共领域的恐惧有关。在接受长期援助的人中，被鉴定为心理症状的数量有所增加。由于这一切，"心理医生

"越来越难以区分被排斥者的病症和被正式承认的精神病患者的病症（根据ORSPERE的文章）。

²⁶ Castel (1999)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 une chronique du salariat Paris Gallimard

²⁷ 在CNDP组织的辩论中提到的，见Paugam (2001)

²⁸ 特别是见Mihaly Csikszentmihaly (2004) 的开创性工作。

bonheur" (2004)。未被翻译但重要的美国作家和作品有：阿盖尔 (2001)、彼得森和塞利格曼 (2004)、斯奈德、洛佩兹 (2001)、吉勒姆 (2000) 和西班牙语的维拉-波塞克 (2006)。有趣的是，马丁-

塞利格曼 (1995年, 1998年, 2002年)，积极心理学的领导者之一，多年来一直是他所谓的 "习得性无助

"研究的全球推动者 (见1974年)。这种早期的研究无疑对理解抑郁症过程很有帮助，但马丁-

塞利格曼转向理解人类发展的积极动力，特别是从乐观、幸福和福祉出发，是抵制普遍存在的受害/攻击行为，并提出更多人文和人道主义干预措施的重要部分。

"无论是否被排斥.....他们都想生存！"。

正如Sébastien

Schehr (1999年, 2001年) 正确指出的那样，生活并不局限于工作.....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工作，他还是必须继续生活.....此外，困难可能来自于失业以外的东西，"疏远、脱离、异议 (也) 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当不幸的事情成倍增加时，无法忍受的极限就会到来。正如其他地方提到的 (Tap, Tarquinio and Sordes-Ader,

2002)，压力事件的倍增 (失业、疾病、婚姻破裂，但也包括行政程序和其他日常烦恼) 对人的应对方式起着重要作用。身份

"变量，如社会出身、年龄、性别等，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相反，有关个人在过去两年中经历的日常困难和重大事件的性质和数量对幸福感的下降有很大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下降在两到三个事件之后往往会加速 (Grob)²⁹。这一结果显然提醒我们，复原力有其局限性³⁰；但它也提出了困难倍增的根源问题：它们是不幸的巧合，是由个人引起的意外，并随着他的脆弱性的加剧而倍增，还是通过基于对这个人的排斥和污名化的态度和行为而产生的社会影响？

从生存到生活.....或者说是困难情况的积极管理。

正如Schehr (1999, 2001)所说，"消极主题

"一般与以下假设有关：无家可归者没有做他或她应该做的事情，以解决他或她的问题，抵御他或她所面临的情况，也与他或她自己的破坏性部分作斗争。意识的演变和对排斥原因复杂性的认识，使人们放弃了将受排斥者仅仅视为懒惰和反社会的形象。尽管如此，(美国) "赢家 "和 "输家

"之间的对立形象在大众的表述中仍然非常强烈。最初对 "无懈可击

"的复原力的构想也是基于这种表述。"为了摆脱困境，你必须.....

"采取行动，把注意力放在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它引发的情绪上，承担责任，等等。正如舍尔所说，"我们只能通过一个典型的理想人物的眼睛来思考他人，一种生产主义自我的理想.....；(例如，我们应该) 设法思考他人，失业者或不稳定的人，而不需要工人模式的扭曲的镜子。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表述的问题，正如我们在Paugam身上看

²⁹ Grob, A. (1996) Entwicklung und regulation des subjektiven wohlbefindens (habilitation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Bern), 69p

³⁰关于复原力及其与排斥的联系，见Boris

Cyrulnik的优秀作品 (1999年，特别是2001年)。另见Tap (2005)，Vinay, Esparbès-Pistre和Tap (2000)。

到的那样，我们必须考虑到意义、真实的行为，特别是人们在被排斥情况下的适应模式。谢尔同意这一点，他建议承认所谓的 "不合格 "的能力，并承认他们有 "脱离关系"的权利。这也是Garnier-

Muller (2000, 2001) 在与无家可归者交谈后所主张的。她认为，"穷人从来不是被动的，他们重新构建了社会融合的形式和非正式的等级制度.....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生存的前提是发明或重新组合社会联系".....

"我们的调查领域，远不是社会冷漠的地方，是一个充满泡沫的行为世界.....。(穷人)并没有沦落到依附于社会联系的碎片，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化形式，尽管困难重重，但却授权了除辞职以外的东西".....她还说："乞讨、小规模贩运是另一种组织和融入社会和经济的方式".....这些人的存在方式非常不同。这些可以表现在生存的组织中，或表现在 "轻微犯罪

"的行为中，或表现在依赖性的攻击中，或表现在对被视作可耻的贫困的无形适应中。因此，这个问题与我们 "限定 "或 "取消

"这些行为的方式有关：要么我们将它们同化为 "d-

系统"（清道夫系统），就像上次战争之后那样，要么我们将它们纳入犯罪行为的范畴。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出现基于 "取消资格 "判断的压制行为和基于 "受害

"判断的援助处于危险中的人的行为之间的困难过渡问题。我们可以参考警察或地方当局的困难，他们经常不得不在寒冷季节 "驱赶

"住在这样那样地方的无家可归者（无论是否有唐吉珂德的帮助！）。驱赶无家可归的人很有趣，但也很可悲，即使我理解执法人员以及政治家的担忧。如果个人很难有效地对抗他或她是否是受害者的排斥，重要的是看他或她如何使用他或她的内部资源（复原力，控制和批判性反思情况的能力，应对或积极管理压力的能力，等等）。但是，对于那些想要帮助他们的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得到的或可以得到的帮助（外部资源）有什么效果：来自家人和朋友、熟人或负责接待和支持困难人群的公共服务机构的支持。

排斥和复原力 ³¹

一个人被说成是有弹性的。

1.如果他们经历了一个极端的情况，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功能障碍的事件，一个 "虐待 "造成的高压力和一般的破坏性影响。

2.如果她能够渡过这一难关，在没有对她的心理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破坏性影响的情况下度过这一事件。这一点在整个人生中都是如此，因为发展不会在青春期停止！"。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Bruno

Bettelheim) 对极端情况下的心理影响进行了最早的分析。在《生存》(1979) 中，他说："当我们突然被推入一系列的生活条件中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旧的价值观和应对机制不再起作用，其中一些甚至危及它们本应

³¹我在此重复我们与玛丽-克里斯蒂娜-洛尔卡 (Marie-Christine Llorca) 为CREAI-PACA "排他性过程 "特刊 (2004年) 中的 "Au fil du mois "评论所制定的内容，并做了一些修改。我要感谢Marie-Christine Llorca和Philippe Pitaud，他们负责这个问题 (见Tap and Lorca 2004)。

保护的生命.....所有（我们）对死亡焦虑的防御措施突然同时崩溃，使我们陷入我所说的极端情况，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同上，24）。因此，有弹性的人将是那个在极端情况下幸存下来的人。贝特尔海姆在这个"生存"过程中唤起了两个阶段，两个截然不同但又非常相关的阶段。

- 与极端的恐怖主义制度有关的原始创伤³²，在当时造成了人格的退化，由于被剥夺了支持而破坏了以前的社会生活。

- 随后的影响，就脆弱性而言，对人的整个生活的影响。

然后，幸存者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做出反应。

- 1. *允许自己被这一经历所摧毁*，这种态度建立在无力重建自己的感觉上，建立在内疚和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感觉上："我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而且我还得为自己辩解，为自己负责！"。
- 2. *否认任何持久的后果*。这个人并不否认所经历的历史事实，但他/她否认、压抑或压制一切可以与当前影响相联系的东西；他/她拒绝了必要的个人重组或不可避免的关系、公理或文化重组的想法。这个过程可以是有意识的（否认）、前意识的（否认、压抑）或无意识的（压抑）。
- 3. *挣扎着保持意识，努力应对对他来说最可怕的层面，并能够重新整合（重组）自己*³³。

在我们看来，这些过程似乎适用于许多情况³⁴，特别是那些与排斥有关的情况，无论其形式如何。在这种危难时刻，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被强加在相关人员的意识中。仿佛我们只有在苦恼的时候，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会担心人生的目的和身份的意义。正如贝特尔海姆（1979）所指出的，这种探索将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苦难的真正意义，或者顺便理解别人的苦难，因为

"一旦人们相信苦难的状态是可以逆转的，而且它肯定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最糟糕的苦难就会被软化"（同上，15）。如果生活失去了所有的意义，这个人就会觉得自杀是一个致命的解决办法。但自杀的诱惑最常与绝望的呼救联系在一起，以引起他人的回应，重新获得自己生命的意义，如果与他人的爱和帮助联系在一起，这是自杀的唯一解药（即使这个人逃离和拒绝这种帮助）。事实上，可以认为，在他或她的一生中，这个人面临着多种问题，必须管理或克服多种冲突。这些冲突甚至有利于他或她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个没有被征服或被异化的主体）和他或她的个人能力，以做出选择，通过项目为自己定位，为自己的困难赋予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人是在社会环境中生活和进步的，这些社会环境包括他们的规则体系（制度）和宣传和谐或对立的价值观体系（文化）。换句话说，社会结构携带的意义是由文化作品、信仰体系和对世界和生活的解释所合法化的，人将适应、转变或拒绝这些意义。同样，社会变化必然影响个人变化。分析这些动态联系很重要（Esparbès-

³²1943年，贝特尔海姆发表了一篇题为《极端情况下的个人和群体行为》的文章，开头写道："作者在德国两个最大的政治犯集中营--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度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时间跨度为1938-1939年"

³³这里应该指出，贝特尔海姆说的是精神整合（或重新整合）。但整合的定义同样适用于个人系统和社会系统。当然，变化的是系统的性质、子系统以及运作和调节的模式。

³⁴将被排斥者的生活与贝特尔海姆提到的集中营囚犯的生活相比较，似乎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自己曾在两个这样的集中营生活过）。但是，情况的极端性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还取决于人体验这些条件的方式，并增加了情绪和感觉（焦虑、压力、不公正和不可忍受的感觉），这些情绪和感觉会使他或她窒息，促使他或她逃离这种极端的体验，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

Pistre和Tap, 2001)。主体和机构的不断对抗, 在前者和后者之间激起了真正的"重构" (Baubion-Broye, Malrieu and Tap, 1987)。这里不仅有互动或交易, 而且有互惠的结构化或解构。在一篇题为"复原力或为生命而斗争"的文章中, 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塞尔吉-蒂塞隆(2003年)与复原力的概念开战, 他将复原力与美国人心目中的生命斗争联系起来。弹性, 因为它与"自主的自我"有关, 根据达尔文的概念, 将是一个有利于最能干的人成功的例子。然而, 在美国人看来, 成功等同于美德。作者对复原力的概念提出了三点批评。

1

这是很模糊的, 因为它掩盖了人为应对创伤而形成的防御的脆弱性。心理阻力会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复原力是"永不稳固"。

2.复原力也掩盖了旨在对抗创伤后果的各种防御机制。有些机制旨在肯定个人的选择, 而其他机制则相反, 强调对他者、对群体的无条件依赖。

3.复原力涵盖了创伤的适应过程, 它可以使"前受害者"和他或她的随行人员受益, 也可以使当事人受益而牺牲他或她的随行人员。救赎的神话也就不远了, "有弹性的人被认为已经克服了他的痛苦的黑暗部分, 只保留了光荣和明亮的部分"。³⁵

但成功克服创伤并不意味着所有仇恨的痕迹, 以及对施暴者的暴力回报都消失了。社会联系的回归可能

"无限期地麻痹了潜伏在受挫人格深处的怪物"。作者最后明确指出, 对创伤的抵抗感兴趣的精神分析学家(费伦西、安娜-弗洛伊德、温尼科特)放弃了将更多来自环境而非每个人的心理潜能的现象归入同一术语下。有几位作者提到, 同样的心理过程在道德或社会方面可以导致最好或最坏的结果。Malrieu

(2003)表明, 个人化的过程也在一个党卫军中起作用, 他离开了他以前的状况, 在他的法西斯主义承诺中找到了社会价值和个人一致性的手段。此外, 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Michel Hanus在其题为《La résilience, à quel prix?Survivre et rebondir》(2001)分析了人们在面临困难情况下的复原力的例子, 特别是儿童, 他们不仅没有崩溃, 而且似乎在这些磨难中发展了真正的抵抗能力, 甚至是成就感。这些观察的意义在于表明, 每个人都有隐藏的资源, 可以在这些创伤性的环境中被调动起来, 最坏的情况永远不会被确定。"然而, 我们不应低估潜在的情感创伤的现实, 它还没有愈合。因此, 在复原力方面, 我们就像在身份认同方面一样, 面临着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它包括多种含义, 但却引入了一个主要问题: 即对人、心理过程、态度和人类机制的信任或不信任。我们可以决定, 人类灵魂的深处是"畸形的"或"自然是好的", 受害者可以成为刽子手(通过与侵略者的认同)或重复他或她的受害情况。在侵略者/受害者/复原者三部曲的工作中, 意味着接受一种复杂性, 每个人都不是全黑全白, 每个人同时都在寻找爱、权力和认可, 个人故事与社会联系和自恋过程交织在一起, 不可分割。我们也不能把社会心理过程与与价值有关的感受的性质以及这些价值(科学、伦理、审美、法律和关系)之间的动态关系分开。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应该指出, 必须考虑到普通公众对复原力概念的兴趣。从根本上说, 它被认为是对希望的呼唤。"如果那些经历过极端情况的人没有被它们摧毁, 那么我也可以希望,

³⁵这最后一句话引入了对摩尼教的批评, 摩尼教的基础是复原力: 胜利者--受害者, 黑暗力量--光明力量, 这种摩尼教在《星球大战》类型的电影中直接被明确化了! 这就是摩尼教。

可以看到隧道的尽头。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幻觉，使我们活着。但这必然要通过预期和项目的实现来平衡。

排斥和外部资源：社会支持

个人可以通过他或她得到的社会支持安排来补偿损失的客观情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社会支持（或关系社会支持）概念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网络功能属性的信息，并关注对个人有意义的网络，即对主体具有象征性和情感性意义的社会群体：这些网络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有帮助，它们是否可以使用，或者人们如何使用它们？

主要网络（朋友和家庭）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它是微观社会和宏观社会之间的一个中介空间或缓冲空间³⁶，通过它，个人可以融入社会，并由于网络的信息和规范支持而建立自己的身份。它起到了空中飞人的网的作用，使其在遇到困难（疾病、失业）时避免被二级（社会）网络接管。社会支持的概念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在社会上得到良好的安置。他或她的网络必须充足，配置良好，结构合理。出现的问题是良好网络的定义。社会行为者的主要支持网络的存在似乎更具有决定性，如果它发挥作用，如果它给予面对社会问题和风险的能力。排斥或边缘化的病理影响可能发生在这些网络中，因为

"社会主体的这些最小单位应被视为其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承担者"。正如当被疾病或失业贬低的人不能再保持他们在一个涉及平等或互惠的系统中的地位时，网络可能"不再回应"。Donati（1994: 83）强调了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之间的联系。"正式-非正式的组合对于社会关系的正常运作似乎越来越重要"，从而强调了个人关系的必要社会调色板，这些关系从亲密的亲密关系到更松散和更遥远的机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看来，对网络提供的支持的挪用是一个更大的战略整体的一部分，个人将或多或少地成为受益者，或根据他或她的需要专注于某一类型的帮助。社会支持的效果确实被赋予情境的意义所调控。我们已经证明（Tap和Vasconcelos，2004）³⁷，有一些社会心理机制可以解释工作无保障的不同影响。关系网络中的邀约和登记模式既能告诉我们这个人重视的活动领域，也能告诉我们社会关系的制约或资源功能。（Cazals-Ferré, M.P., Llorca, M.C, 2002）

。一些战略侧重于关系纽带的重要性，而淡化工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提到工作只是略过了，因为工作在目标的层次中被放在第二位。使用所有的网络，亲密的、友好的、形成性的和专业性的网络，将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结合起来，不断支持过渡情况（失业），这并不被视为一种断裂。这种社会支持的概念隶属于缓冲模型（Cobb and Kasl, 1977, Cohen and Wills, 1985）。这个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健康有间接影响。

自尊和社会支持之间的联系，作为打击排斥现象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社会支持只有在满足面临特定厌恶情况的人的需要和期望时才是有益的。此外，只有当压力源的强度很高，并且"接受者

³⁶这就是"缓冲"效应。例如，见Plancherel、Bolognini和Nuñez，1999。

³⁷在这项法葡集体研究中（图卢兹/科英布拉），我们表明处于不稳定状况的人和没有社会经济困难的人之间存在心理和社会心理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像我们假设的那样强烈。

"认为问题的特点、支持的类型（情感、物质）和来源（家庭、朋友、同事）之间的一致性时，支持的行动才会有效。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支持非但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反而倾向于导致压力和攻击性反应的增加。根据³⁸Nadler和Fisher（1986）的说法，西方社会要求人们是无懈可击和自给自足。它从自主和竞争的"积极"模式中激励人们。于是，在学校里，寻求帮助就被认为是无能 and 不足的证明。当然，这种影响过程可以通过教育、教学和关系方法来反击，以不同方式引导帮助关系。但是，当个人已经系统地学会将他的个人尊严、自尊与任务联系起来时，当别人想给他支持时，他会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质疑，个人价值受到威胁。然后，作者对比了两种观点。第一种，即经典的脆弱性观点，假定一个自卑的人不敢求助（--策略）³⁹；反之，一个自我形象良好的人，会发现求助是很自然的（++策略）。在第二种情况下，相反，一致性的观点，自我形象好的人将感到受到他人帮助的威胁，并会避免请求帮助（+-策略）；相反，自尊心低的人将把他人视为上级，向其请求帮助是很自然的（-+策略）。这四种策略在现实中无疑是存在的。它们也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相互跟随，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期。Nadler和Fisher提到的两个概念（自尊和一致性）是任何身份认同的两个主要维度：积极性（自尊、个人价值感）和统一性（一致性、连贯性）（Tap, 1991, 1993）。然而，在面对排斥时，会出现身份危机，这往往有可能转化为针对自己或他人的暴力。总之，应该指出，身份总是在心理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夹缝中得到管理，即使人们想孤立自己或被迫这样做以逃避不可承受之重。

参考书目

Abric, J.-C.(ed.), *Exclusion sociale, insertion, prévention*, Toulouse, Eres, 2003.

Argyle, M. (2001). *幸福心理学*。Routledge.

Baubion-Broye, A., Malrieu, P. & Tap, P. (1987). *L'interstructuration du sujet et des institutions*, *Bulletin de Psychologie*, 379, 5-9, 435-447.

贝特尔海姆, B. 生存。(法译本), 巴黎, Robert Laffont 1979年(第一版, 1952年)。

Cartwright, D., Zander, A.F. (Eds). *团体动力学：研究与理论*，纽约, Harper & Row, 1968（第三版）。

Castel, R. *De l'indigence à l'exclusion: la désaffiliation*. In J. Donzelot *Face à l'exclusion*, Paris, Esprit, 1991.

Castel, P.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 une chronique du salariat*, Paris, Fayard, 1995.

³⁸在这句话之后，继续将社会支持与"调节器"一词联系起来是值得怀疑的。用"调制器"一词会更合适。这将意味着，社会支持可以增加或减少压力，增加或减少风险或保护措施。

³⁹第一个符号代表自尊（+或-），第二个符号代表对社会支持的态度（+或-）。

Castel, P. 参与CNDP/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教育圆桌会议："L'exclusion existe-t-elle?2001年3月

Castra, D., L'Insertion professionnelle des publics précaires, Paris, Puf, coll. "Le travail humain", 2003.

Cazals-Ferré, M.P. and Llorca, M.C. L'impact de la précarité sur la vulnérabilité et la santé des individus, Pratiques psychologiques, n° spécial Précarités, n°4, Paris, P.U.F. p. 51-65. 2002

Csikszentmihalyi, M. (1990).流动。最佳体验的心理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法文译本：《生活，快乐的心理学》（2004年，拉芳）（2005年，口袋）。

Cyrulnik, B. De chair et d'âmes.巴黎， Odile Jacob, 2006 Cyrulnik, B. Parler d'amour au bord du gouffre.巴黎， Odile Jacob, 2004

Cyrulnik, B. Le murmure des fantômes.巴黎， Odile Jacob, 2003 Cyrulnik, B. Les vilains petits canards.巴黎， Odile Jacob, 2001

Cyrulnik, B. Un merveilleux malheur.巴黎， 奥迪尔-雅各布。1999

Donati, P. (1994) La prospective relationnelle dans l'intervention de réseau: fondements théoriques.In Sanicola, L. dir. L'intervention de réseaux, (pp. 61-109), Paris, Bayard.

Donzelot, J. Face à l'exclusion, Paris, Esprit, 1991.

Dupriet R., Ladsous J., Leroux D., Thierry M., La Lutte contre l'exclusion: une loi, des avancées, de nouveaux défis, ENSP, Rennes, 2002.

Emmanuelli X., L'exclusion peut-elle être vaincue ?巴黎， 拉芳， 2003

Esparbès-Pistre, S. and Tap, P. Identity, project and adaptation in adulthood.Carrièreologie Revue Internationale Francophone, vol. 8, n° 1, 2001, 133 - 145.

Garnier-Muller, A. Les Inutiles: survivre en banlieue et dans la rue. 2000 Paris, Ed. de l'Atelier.

Garnier-Muller A.参加CNDP/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教育圆桌会议："排斥现象是否存在？2001年3月。

Gillham, J.E.(The Science of Optimism and Hope: Research Essays in Honor of Martin E. P. Seligman. 2000, Radnor, PA: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

Grob, A. Enwicklung und regulation des subjektiven wohlbeindens.伯尔尼大学专业学位手稿， 69页， 1996b。

Hanus, M. Resilience at what cost?生存和重建。巴黎， Maloine, 2001

Kaës, R. et alii Différences culturelles et souffrance de l'identité, Paris, Dunod

Llorca, M.C., Cazals-Ferré, M.P. Poussin, M. 融合和社会支持在P. Tap和M. de L. Vasconcelos。不稳定和心理上的脆弱性。法国和葡萄牙的比较, (第71-88页), 图卢兹, Erès, 2004。

Malrieu, Ph. La construction du sens dans les dires autobiographiques, Toulouse, Erès.

Montmollin, G. de L'impact sociale.现象、因素和理论。巴黎, P.U.F. 1977

Nadler, A., Fisher, J.D. The role of threat to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control in recipient reactions to aid: theory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在L.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9, (pp. 81 - 123), New-York, Academic Press.

Parizot, I., Soigner les exclus.Identity et rapports sociaux dans les centres de soins gratuits, Paris, Puf, "Le lien social", 2003.

Paugam, 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et ses pauvres, Paris: P.U.F 1993

Paugam S. L'exclusion, l'état des savoirs, Paris, La Découverte.1996

Paugam, S. (2001)参加CNDP/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教育圆桌会议："排斥现象是否存在？2001年3月。

Paugam, S., La Disqualification sociale.Essai sur la nouvelle pauvreté, Paris, Puf, 2002, 2nd edition.

Peterson, C. and Seligman, M. E. P. (2004).性格优势和美德：手册和分类。牛津大学出版社。

Plancherel, B., Bolognini, M. and Nunez, R. The Buffer Effect Hypothesis in preadolescence.在M. Bolognini, B. Plancherel, R. Nuñez和W.Bettschart 青春期前。理论、研究和临床。

Ricoeur, P. Soi-même comme un autre.1990年, 巴黎, Seuil 24

Rogers, C. The helping relationship and psychotherapy 2005, Paris, ESF

Schehr, S. La vie quotidienne des jeunes chômeurs.1999年, 巴黎, PUF

Schehr, S. 参与CNDP/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教育圆桌会议："L'exclusion existe-t-elle?2001年3月

Seligman, M.E.P. Depression and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Friedman, R.J. and Katz, M.M. (eds.) The psychology of depression: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research.1974年, 纽约。威利。

Seligman, M.E. P. Authentic Happiness: Using the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to realize Your Potential for Lasting Fulfillment. 2002年, 纽约自由出版社。

Seligman, M.E.P. Learned Optimism. 1998年, 纽约: Pocket Books (Simon and Schuster) 。

Seligman, M.E.P.

《乐观的孩子: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 以保护儿童免受抑郁症的影响, 并建立终身的复原力。1995年, 纽约Harper Perennial。

Seligman, M.E.P., Reivich, K., Jaycox, L., & Gillham, J. The Optimistic Child. 1996,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Snyder, C.R., and Lopez, S. J.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1, 牛津大学出版社。

Sordes-Ader, F. & Tap, P. Socio-economic insecurity and vulnerability, Pratiques psychologiques 2002, 4, 66- 78

Tap, P. Socialisation et construction de l'identité personnelle. In H. Malewska-Peyre and P. Tap La socialisation de l'enfance à l'adolescence. 1991年, 巴黎, P.U.F.

Tap, P. 身份危机、抑郁症和青春期的吸毒。 In P. Tap and H. Malewska - Peyre (eds.) Marginalities and socialization disorders. 1993年, 巴黎, P.U.F.

Tap, P. 身份、认可和工作关系。特刊《行动的社会学》。L'engagement de Renaud Sainsaulieu". 社会学, 实践。2003, n° 8, 69-75.

Tap, P. 身份与排斥。Connexions, 2005年, 第83期, 第53-78页。

Tap, P., Beaumatin, A., Esparbès, S., Michon-Tap, C. Insertion et Intégration sociales: des notions aux pratiques. Annales de Vaucresson, 1990, n° 32 - 33, pp.69 - 81.

Tap, P., Llorca, M.C. Exclusion, poverty, integration, violence, resilience and social support: from concepts to practices. 特刊 "排斥过程", Revue Au fil du mois ... CREAM PACA, 2004, 第7-17页。

Tap, P., Tarquinio, C. and Sordes-Ader, F. Health, Illness and Identity in G.N. Fisher Traité de psychologie de la Santé, 2002, (pp. 135 - 162), Paris, Dunod.

Tap, P., Vasconcelos M. de L. (在指导下), Précarité et vulnérabilité psychologique, comparaisons franco-portugaises. 2004
图卢兹, Erès, 247页。(葡萄牙语版本: Precariedade e vulnerabilidade psicologica, Comparações franco-portuguesas. 2004 Coimbra, Fondation Bissaya Barreto, 287 p.) 。

Tisseron, S. Ces mots qui polluent la pensée : " Résilience " ou la lutte pour la vie. www.monde-diplomatique.fr; Août 2003.

Vera Poseck, B. Psicología Positiva: una nueva forma de entender la psicología. Papeles del Psicólogo 卷。 27: 3-8, 2006

Vinay, A., Esparbès-Pistre, S., Tap, P.
复原力强的人的依恋和应对策略。国际家庭教育杂志。复原力特刊, 4, 1, 9-36。

Wallon, H.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chez l'enfant 1945, Paris, PUF.